

# “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

## ——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

邹婷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白居易对佛教的皈依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年对佛教的初步接触与认识到因生活变迁而对佛教产生深刻的体认,从而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加以实践并指导人生。贬谪江州是此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对大乘佛理的深入领悟和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使白居易将自己的活动融合到居士生活中并最终成为香山居士。本文认为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变不仅反映了白氏对大乘佛教的思想选择,也是白氏思想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净名居士;香山居士;大乘佛教;居士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3-0072-03

白居易的思想行为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白居易不仅在思想上经历了转变,在行为上也努力进行了大乘佛教的实践。此过程中所包含的他对大乘佛教的选择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在唐代,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大到国家礼仪,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和各种宗教仪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sup>[1]</sup>佛教是唐代兴盛的宗教派别之一。因此,家庭及生活背景均与佛教有所关联的白居易接触佛教是比较早的。白居易夭折的弟弟幼美曾取小名为金刚奴。其中的“金刚”就是佛教中一个护法天神的名字。白氏的堂姐即其叔父白季康的前夫人薛氏所生之女未笄便出家了。十几岁时白氏就有了“衡门寂寞朝寻我,古寺萧条暮访君”、“雨天连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桥上”(《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的经历。所以,早年白居易便表达了自己对佛教的初步认识:“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失,不教烦恼生。”(《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感芍药花寄正上人》)此时的白居易对佛教的认识处于较为肤浅的“色相”、“幻身”的层面上。而后来在凝公大师点拨下,白居易在《八渐偈》中所表达的对“观、觉、定、慧、明、通、济、舍”的扩充与理解表现出他对佛理的认识有所深入。苏辙在读过《八渐偈》后甚至认为诗中包含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sup>[2]</sup>的要旨。

初涉世事的白居易在长安为官时不仅已经阅读了佛经,

还将佛教作为了自己的“觉归”之处。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的序中他表白了归觉佛门的态度:“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返乎?将安归乎?”初入官场的白居易就已经将佛教作为自己的解脱之门了。诗人的自由率性与现实的束缚使白居易常有忧患之思。为了调理性情,平和心境,他试图通过观幻而空名利、达生死并达到“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重酬钱员外》)的境界。苏辙对此已早有认识:“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屡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sup>[2]</sup>在《夜雨》、《和思归乐》、《梦裴相公》等诗中,白居易反复表达了因观世事的多变而悟空幻的道理。但白氏对生活的态度又是随性自然的:“既不逐禅僧,林下学楞伽。又不随道士,山中炼丹砂。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何不饮美酒,胡然自悲嗟。”(《劝酒寄元九》)这种重观空幻悟理而不行禅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涉世不深、极重性情的白居易对佛教最初的态度与选择。

世事的多变使白居易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元和六年(811)的丧母失女使其对生死离别之苦有了切肤之痛。佛教的空幻之理只能暂时抚慰他失去亲人的悲苦而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情:“恩爱元是妄,缘合暂为亲。念兹庶有悟,聊用遣悲辛。惭将理自夺,不是忘情人。”(《念金銮子二首》之二)在下邳的三年中,白居易从长期无法消除的痛苦中学会了坐忘。“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寞安可过。”(《冬夜》)在坐忘中,他渐渐明白了“息乱归禅定,存神

收稿日期:2007-08-15

作者简介:邹婷(1980—),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入坐亡。断痴求慧剑，济苦得慈航”(《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的佛教道理。于是在814年的《游悟真寺诗》中白居易自言：“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这是他第一次在诗中将自己与“居士”联系在一起。自下邳返京后，白居易改变了不行佛教禅法的态度。在《重到城七绝句》之《恒寂师》中他表示“会逐禅师坐禅去，一时灭尽定中消”。从朝服到居士衣，从“不逐”到“会逐”，白居易对佛教的理解与体认在现实中得到加强。而贬谪江州进一步促生了他的居士情怀。

元和十年(815)冬，白居易因上疏言武元衡事遭排斥而贬江州。贬谪之事使白居易亲身体会到仕途名利的多变和荣辱生死之惊，也给怀有兼济之志的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困顿中，诗人不仅开始研读《楞伽经》等佛书，还去庐山东林寺学习坐禅。“唯有无生三昧观，荣枯一照两成空”(《庐山草堂夜雨独宿》)的佛理使他有了“穷通生死不惊忙”(《遣怀》)的感悟。于是，在《赠韦炼师》中，白居易一改忧怨愁苦的迁客情怀，以“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的佛教思想表达了自己以佛理解脱的居士情怀。这种居士情怀是在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之后，白居易在诗文中便常以居士自称：“先生乌几几，居士白衣裳。”(《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居士荤腥今已断，仙郎杯杓为谁排？”(《酬皇甫郎中对新菊花忆见》)连友人牛僧孺也称其为居士：“唯羨东都白居易，月明香积问禅师。”(《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身为士大夫的白居易一直秉承儒家兼济独善的思想，而此种思想与他的居士情怀并无抵触。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大乘佛教将自我解脱与普度众生并重，以慈悲心为根本，不离世使众生解脱，这些思想与儒家的仁爱兼济之心具有共通之处；另一方面，居士思想在肯定了不离世间修行亦可成佛的基础上对居士修行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解脱方式和途径，这进一步加强了与关注现实生活又重视独善的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因此，从早年的《新制布裘》(约807—815)到大和六年(832)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白居易的仁心在其居士情怀的促进下得以深化。《新制布裘》中所表现出的“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纯儒家式的仁心。而在以慈悲为本的大乘思想的作用下，《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所表现出的“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的仁心则明显带有普度众生的居士情怀的意味了。“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sup>[3]</sup>白居易能够在安处中“推身利以利人”<sup>[3]</sup>，这种仁贤确实值得称道。

白居易在晚年曾言自己“礼彻佛名百部经”<sup>2</sup> (《欢喜二偈》之二)。在其《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他曾表达了对《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等大乘经书的个人见解：《法华经》与《维摩诘所说经》蕴涵三乘道法及一切智慧神通妙法。二经以透彻究竟的说理使人认识到大乘佛教不可思议的事理。《金刚经》将一切看“空”，以我法俱空来破除各种虚妄观念与世俗相近而使人达到身智皆灰灭且一无所求的境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则使人易依佛智看空缘起于意识而引起的所有

一切，从而达到最高佛地。这些见解充分表明，他对大乘佛教“菩提心为因”，“慈悲心为根本”，“方便为究竟”的主要思想已有了较深的把握。在这些大乘经典中，《维摩诘所说经》自入华以来受到了历代居士的推崇而成为在家修行者的必读书。经中的维摩诘是一个不离世俗之乐又具佛教大智慧的人。维摩诘不仅为白居易实践大乘教理提供了重要指导，更重要的是，经中所宣扬的大乘思想特别是“菩萨行”(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主要途径进行修行)的思想将白居易的居士情怀与其重视性情的世俗生活融合到了一起。

在净名居士“诸度法等侣，四摄为妓女；歌咏讼法言，以此为音乐”<sup>[4]</sup>的指引下，白居易声色歌舞、饮酒作诗的俗世生活具有了修行的色彩。而对老庄及道教的关注与实践也是白居易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从其丹药之行和知足之思来看，“白于信奉老学，在其炼丹服药最后绝望以前，亦始终一致。”<sup>[5]</sup>其于诗文中表现出的“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sup>[5]</sup>。白氏由老子而来的知足是消极的，与佛教的忍辱精进不同。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唐代的社会背景和白氏对大乘佛教思想的理解来看，“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sup>[4]</sup>的行为与居士生活并无冲突。“元和中，方士烧炼之术盛行，士大夫多有信者……香山性情本无拘滞，人以为之，亦姑从之，然终未尝以身试耳。”<sup>[6]</sup>在坚持佛教修行的前提下，虽然白居易直到开成四年(839)才在《戒药》中表达了“悔悟之意”，但烧丹的失败使他明白了“神仙须有籍”(《归田三首》)的局限。长庆初年白居易受戒后，与僧人往来、研读佛典、持斋坐禅等活动便成为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他的居士情怀逐渐转变为在现实中行菩萨行的实践。在杭州他为民修建了捍湖堤；在苏州为了便民他又修建了山塘街(又名白公堤)；在洛阳他捐钱重修了香山寺并施财开八节滩为百姓造福。对佛教的实践和深刻的领悟与其烧丹服药的实践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了。因此他才在《答客说》中自称“吾学空门非学仙”，“归即应归兜率天”。

对于白氏诗中屡言不已的自足思想，我们不能否认它与老庄的关联。但同时，从“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先宜知知足，次要悟浮休”(《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大乘佛理的领悟促使白居易将老庄的自足思想融合到了佛教的修行中。老学的知足是消极的，它“苦县则以知足为怀，藉免受辱也”<sup>[5]</sup>。但当白居易领悟到“他时事过方应悟，不独荣空辱亦空”(《寄潮州杨继之》)的道理时，其思想中的“知足不辱”也与佛教的“忍辱精进”更加贴近了。

白居易的居士情怀加深了他对《维摩诘所说经》的喜爱，这种喜爱又升级为以净名或维摩来指代自己。比如：“可怜狮子座，异出净名翁。”(《夜从法王寺下归岳寺》)“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钱。”(《自咏》)“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早服云母散》)“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何烦更请僧为侣，月上新归伴病翁。”

(《病中看经赠诸道侣》)由此看出,在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日益加深的居士情怀促使白居易在思想和行动上向以维摩诘为典范的居士努力行进了。

### 3

白居易不仅读维摩诘经,作维摩诘诗,行维摩诘事,还以维摩诘为伴。从“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三年除夜》)中即可看到其素屏之图即是维摩居士画。这足以见出白氏对维摩诘的喜爱与重视。为了达到如维摩诘般的解脱,白居易运用大乘思想指导现实生活,调理性情。他以“中隐”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选择。从其《中隐》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白居易来说,“出与处的界限并不在为官与否,亦不在身处丘樊或朝市,心中无事亦即归卧山林,洛阳履道宅的竹木池馆亦即林下之隐。‘无事’正是白氏‘中隐’说的基础。”<sup>[7]169</sup>正是这种事事无可无不可的“无事”态度使白居易在充满功名利禄的俗世中获得了个人的“闲适”之趣。而他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正是出自洪州禅的影响<sup>[7]170</sup>。诗中所表现出的“闲适”也“渗透着与洪州禅情调一致的世俗性和日常性”<sup>[7]179</sup>。也正是这种“中隐”与“闲适”使白居易常为后人所仰慕。正如皮日休在《七爱诗之一白太傅》中所言:“何期遇誉毁,中道多左迁。天下皆汲汲,乐天独怡然。天下皆闷闷,乐天独舍旃。高吟辞两掖,清啸罢三川。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可为龟镜焉。”

聪敏的白居易早年便在诗中表达了对人类天性之难为的认识。“杜子美云:‘钟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岂可强也哉!白乐天前有《读史》云:‘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彼戮辱时,奋飞无翅羽。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后又有《咏史》诗云:‘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二诗意绝相类,但未知乐天果能舍彼而就此不?世之人乾没于名利之场,鲜不陷于祸难。”<sup>[8]</sup>世事的多变使他“惟不及汲于进,而志在于退”<sup>[9]</sup>。所以,舍彼就此,白居易于仕途中未被祸患所陷。从中唐激

#### 参考文献:

- [1]荣新江.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 导言[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 [2]苏辙. 栾城后集: 卷二一[G]//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6.
- [3]黄彻. 巩溪诗话: 卷九[G]//丁福保辑.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维摩诘所说经: 方便品第二[G]//林世田, 李德范编. 佛教经典精华: 下册.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3.
- [5]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6]赵翼. 瓯北诗话: 卷四[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萧驰. 佛法与诗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葛立方. 韵语阳秋: 卷十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9]叶梦得. 避暑录话: 卷一[G]//四库全书86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0]温玉成. 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经幢[J]. 四川文物, 2001(3).
- [11]吕澂.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烈的牛李党争来看,白氏之退或许与他在党争中的地位有关,属于无奈之举。但是违背有所作为的人性,在进中主动求退,并不是单凭“知足不辱”的道理就能够实现的。老庄的知足而退的目的只在于“退”的行为本身。白居易曾言“未得无生心,白头亦为天”(《早梳头》)。要真正做到“知足而退”、“退而不辱”就必须以佛教的“无生心”来看待进退。正是因为白居易理解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道理,并以此来调理性情才使自己成为了“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老病幽独偶吟所怀》)的清净之人。

为了“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sup>[4]1450</sup>,白居易不仅结社修净土,还于835年、836年、839年、842年纳文集于佛寺以结后世之佛缘。840年他还命画工画弥勒佛像及西方世界,焚香礼拜。在其《画西方帧记》和《画弥勒上生帧记》中,年老体衰、身有苦痛的诗人发愿供养佛像以回功德施于一切众生。无论白居易是参禅悟佛还是结社修净土,甚至是铸幢信密宗<sup>[10]</sup>,这些都只是他居士修行的一部分,与宗派并无很大的关系。“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sup>[4]1448</sup>白居易一生入世而行,大和三年(829)归洛后,深厚的居士情怀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并由此生发了“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的愿望,与香山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重修香山寺的愿心达成之时,白氏的居士情怀终于得到了升华,他也由“毗耶长者白尚书”(《刑部尚书致仕》)转变成为“道场主佛弟子香山居士乐天”。

吕澂先生曾说:“小乘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而大乘,特别在初期,则以居家的信徒为主。”<sup>[11]179</sup>对居士的重视也成为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区别之一。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白居易经历了从潦倒失意到产生居士情怀得以解脱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佛教的认知与理解也从观幻悟空深入到对大乘空谛、中观等思想的领悟与实践。因此,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变是白公思想历程中不能忽视的重要过程。

(责任编辑:王英志)